

当代藏族作家的文化生态叙事研究 ——兼论当前国内生态批评的局限

傅钱余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 重庆 402160)

〔摘要〕 文化生态问题是当代藏族作家关注的焦点。藏族作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抒写。扎西达娃从简单批判藏族旧有风俗,走向深层次领悟和思考藏族文化的根脉及其当代传承之道;次仁罗布以新的叙事方式呈现藏族文化的精髓内涵,关注藏族化的当代境遇;尼玛潘多原生态地呈现西藏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宏阔主题下生动展现了文化变迁过程中个体内心的复杂过程。藏族作家文化生态叙事研究揭示出当前生态批评的模式化、简单化、泛文化倾向等局限。

〔关键词〕 现代性;藏族文学;文化生态;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3-0130-07

当代世界,现代性的负面作用日益突出,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生态运动与生态保护的热潮。在文学和文化领域,这一热潮促成了“生态批评”。生态批评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在欧美等国家兴起,21世纪初在我国开始出现,目前已成为一个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生态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的自然和环境问题,关注其中的生态叙事与生态思想。其实,对自然和环境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担忧,因为“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所以任何生态灭绝从某些角度看就是一种文化灭绝”。^{[1](P.11)}因此,环境问题乃文化生态问题,而生态批评实乃文化批评,其核心是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2](P.105)}关注“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关系”。^{[3](P.215)}

中国文学语境中,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聚焦的便是文化生态问题,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负面因素,“文化寻根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醒人类的敬畏之心,重新估价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良影响……”^{[4](P.6)}类似的情境也成为西藏文坛书写的社会基础。藏族主要聚居在青藏高原地区,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较国内其他地区相对要晚。但正因为晚,其文化变迁的速度才更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更为剧烈,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所展现的问题更引人注目。检视近30年西藏文学的发展,文化生态书写已成为藏族作家们主动追寻的创作思路。结合生态批评的思路对藏族作家进行深度分析,既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藏族文学的特点,亦能在具体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和深化文学的生态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简介〕 傅钱余(1983—),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民族性’问题研究”(批准号:14CZW065)、重庆文理学院引进人才专项“多学科视野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批准号:R2013WC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扎西达娃的文化生态叙事

在当代藏族作家群中，扎西达娃是较早注意到藏族文化生态问题的作家。早期的扎西达娃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倾向以批判性的视角看待藏族文化。早期主要作品如《朝佛》和《没有星光的夜》聚焦藏族生活世界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对之进行批评。《朝佛》中18岁的姑娘珠玛去西藏朝佛，不但没有祈求到生活的丰足，反而差点遭受几个浪荡青年的侵害。她看到虔诚磕长头的老者重病在身，差点命陨途中，而不信佛的拉萨姑娘德吉却生活得快乐富足。以珠玛的见闻为线索，在珠玛、老人与德吉的对比（旧与新的对比）中，作者企图揭示信仰及其行为的虚妄，突出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也试图指出改变西藏生活世界的路径。《没有星光的夜》中流浪人十年苦寻阿格布，其目的是要通过决斗而报父仇。两人最后惺惺相惜化解仇怨，但阿格布的妻子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帮助丈夫而偷袭流浪人，致其死亡。作者试图反思藏区决斗习俗的野蛮、血腥和不理性，但此时多了一丝犹豫，意识到习俗非一日形成，也难以片刻更改，因此阿格布妻子的行为便是作者这一犹豫的深层体现。

扎西达娃的犹豫，使他更深刻地去把握和体悟藏文化传统，从而完成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型和成熟。如果说扎西达娃早期的小说作品更多关注的是藏族文化的表层，成熟期的作品则把笔触深入到藏族文化的内核。作者的写作态度也从早期的简单批判到成熟期对藏族文化价值的坚守。其写作背景是当代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化加速交流过程中藏族文化受到的冲击，其写作动机则是思考藏族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和价值。因此，扎西达娃成熟期的小说作品呈现为文化生态写作。

以此高度和视角来分析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便不再是“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5] (P.53)}前者在“我”、嫁和塔贝对莲花生大师掌纹地的追寻过程中肯定信仰的价值，并试图追问藏族文化的魂。《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蕴含着大量的对比，有空间的对比（雪亮的山顶与黑暗的沟

壑），有时间的对比（沟壑中时间逆行与沟壑外时间正常），更多的则是人物之间的对比（“我”与“活佛”、“塔贝”与“嫁”、“嫁”与遇见的小伙子等等）。所有的对立都潜在地指向了一个核心的对立：信仰佛教或不信仰佛教。扎西达娃当然没有简单地由此宣扬藏传佛教的价值，作者借由佛教这一藏族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而追问藏族文化之魂。小说非常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化之忧，这通过“嫁”与三个小伙子的相遇而呈现：第一个小伙子拿着有机线图、拖拉机封面的书，他却对“嫁”“行为不太规矩”；第二个小伙子拿着电子计算机，但油嘴滑舌，带“嫁”去的地方有音乐、啤酒和迪斯科；第三个人是拖拉机的主人，他“从嫁那里得到了什么”，同意让“嫁”试试拖拉机，但“嫁”却被拖拉机“咬”一口，口吐鲜血，内脏受了伤。有论者认为：此文通过反思藏族生活世界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体现了扎西达娃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6] (P.79)}若此，“嫁”与三个小伙子的相遇情况该如何解释？显然，此部分内容隐喻的是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在遇到现代文明时所受到的冲击，而现代文明中的负面因素也同时给了藏文化传统一定程度的伤害。扎西达娃意识到，文化交流与碰撞是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交流也会可能导致某些文化变异甚至消失，那么在全球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中，西藏文化传统该何去何从？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藏族文化的精核（魂）到底是什么？如何在当代传承？尽管扎西达娃在小说中没有揭示答案，但却显示了作家强烈的文化关怀。

《西藏，隐秘岁月》与《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同年发表，从创作动机来说，《西藏，隐秘岁月》可视为《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续篇。此文正是作者对自己在前一篇作品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通过作品中人物次仁吉姆的循环、时代变迁中廓康的不变以及圆形的叙事结构，扎西达娃艺术性地展示了自己对藏族文化传统在当代传承的强烈自信。作者坚信，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面前，虽然藏族文化也会经历碰撞的阵痛，但以佛教信仰为根基的、历时久远的藏族文化会以新的形态继续承传，文化的交流也会使藏

族文化的价值走出藏区，走向世界。^{[7](P.43-48)}

二、次仁罗布的文化生态叙事

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同样把目光聚焦到文化生态问题。次仁罗布的崛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相较扎西达娃的主要创作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速度更快，文化的更新和交流也更为频繁，西藏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的冲击也更大。立足藏族地区，关注藏族生活和文化是次仁罗布的写作追求。他曾多次坦言自己文学创作的根基是藏族文化和藏族人民，其文学追求是呈现藏族文学的精髓，并给藏族文学带入新的叙事方法和文学范本。^{[8](P.24)}

《杀手》同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一样，主要线索都是寻找仇人要报杀父之仇。次仁罗布在这篇小说中借鉴了叙事学称之为“不可靠叙述”的手法，确实给藏族文学带来了“新的叙事点和新的文学范本”。小说不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而通过一个人物视角——货车司机来聚焦和叙述整个复仇事件。货车司机偶然搭乘了要去复仇的康巴汉子，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跟随打听对方的复仇结果。从货车司机的视角，读者看到康巴汉子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然而康巴汉子却没有与仇人决斗，而是大哭而去。小说的结尾是货车司机在梦中完成了康巴汉子杀死仇人这一过程。对康巴汉子大哭而去的原因的思索，敞开了小说的多重意义。复仇者寻找到仇人时，仇人已年老体衰，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还有一个小男孩和柔弱的妻子，并且仇人每天都要去寺庙忏悔。佛教慈悲为怀的观念让复仇者动了怜悯之心，在深层宗教驱力的作用下，他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长刀，大哭而去。论者多赞同此种解读，如扬帆便认为宗教精神是解释复仇者大哭而去的深层原因，“宗教观念完全塞满了他头脑和心灵的一切空间”。^{[9](P.100)}次仁罗布没有直接批判决斗习俗，而是通过挖掘藏族民众心灵深层的佛教底蕴来呈现藏族文化的精髓内涵。

次仁罗布的特点在于凸显藏族文化价值却不囿于文化本位主义，在强调文化内涵的同时他

能超越出去，把目光深入到人类普遍的生活状况与心灵境界中。《杀手》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在追寻意义过程中的悖论——人类在追寻意义中肯定自身的存在，但意义本身却往往具有虚无的本质。复仇者挨饥受冻十余年，只为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其意志非常坚定。在长期的寻找中，他想象了无数次与仇人决斗时的刀光剑影以及最终杀死对方的胜利，这给予了复仇者希望、自信、成就感和使命感，最重要的是赋予了自己行为的意义。严格来说，复仇者的复仇早已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复仇，而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式的复仇。卡西尔曾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其原因在于人类会创造和使用符号。^{[10](P.37)}符号即象征，人善于用象征赋予行为以意义。因此，复仇与宗教信仰的行为如朝佛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对象被载入了象征，能够在相应的行为中确认主体价值。对于复仇者而言，过程越是痛苦，意味着复仇行为越是崇高，使命感和完成价值也就越高。然而，当他终于找到仇人时，发现仇人已老去，自己可以轻轻松松地杀死对方。想象中你死我活势均力敌的决斗根本不存在，过于简单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使得复仇者十余年的艰辛变得荒诞。当想象的意义与现实的情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时，复仇者忍受不了意义的虚无和空洞，只能大哭而去。这容易让人联想起著名作家巴金的名篇《复仇》，小说中复仇者复仇成功后绝望自杀，遗书揭示了追寻意义的悖论：“我的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待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一生再也不会那样的幸福了。”^{[11](P.8)}《复仇》可作为阅读《杀手》的参照，两者在内容和主题上具有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与复仇者觉察意义的虚无相对应的则是卡车司机对结果的探寻，卡车司机也在追寻意义，不过是一种浅层次的意义。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价值。他无法理解复仇者找到仇人却离去这一现象，所以在梦中杀人以满足自己的期待。两者潜在的对比凸显了复仇者的觉醒，并让小说呈现出峰回路转、恍然大悟的阅读效应。

次仁罗布的获奖小说《神授》更为直接地

关注藏族文化生态问题。“神授”是成为藏区《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一种方式，艺人一般会突然做一个梦，梦见天神挖开自己的肚子，塞进一些经书，于是醒来就能够说唱格萨尔王的英雄传奇，如著名说唱艺人扎巴就属于此种“神授”类型。^{[12] (P. 74-75)} 小说以此为题材，关注当下说唱艺人的生存现状。小说中说唱艺人在大草原中自由说唱快乐满足，有一大堆面对面的听众。与此相反，为了保护说唱艺术而到研究院录制说唱过程时，他痛苦不堪，甚至逐渐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传统生活方式、民间艺术在现代化冲击下遽然改变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问题是现代性也带来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因素。传统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人情社会，而不是工具世界；民间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基于生活世界，而不是基于经济利益。作者亦直言自己对说唱艺人和说唱艺术怀有崇敬之情，同时又有强烈的焦虑和恐惧，因为在城镇化和现代传媒普及趋势中说唱艺人被边缘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8] (P. 27)} 《神授》要启发思考的正是这一当前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生态问题：传统所赖以立足的语境已然改变，抢救和保存传统的形式其价值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证明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社会？当前语境中，如何激活传统的生命力？在这些问题背后，可以看出作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文化同质化的深深担忧。

次仁罗布善于用新颖的叙事手法来展示自己眼中的藏族生活世界。他的理解和书写都超越了简单、表层的民俗仪式类景观写作，亦不是怀旧式地构筑一个过去的虚幻泡影，而是深入到藏族文化传统的核心方面，关注藏族文化的当代境遇。更值得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借鉴的是，他能够超越民族视野，将问题拓展到人类整体价值的层面上。

三、尼玛潘多的文化生态叙事

一部《紫青稞》让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收获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也使她成为藏族作家群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紫青稞》关注的是西藏偏僻乡村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

小说中普村荒凉、闭塞、贫穷，显然是西藏地区类似村庄的代表，而桑吉、达吉、边吉三姐妹也成为许多当代藏族乡村女性的缩影。用作者的话说，她的创作动机是为了“还原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13] 因为在许多人眼中，西藏是神秘的，是宗教的，是净土，但这是一种文化他者猎奇式的眼光。这既漠视了藏族文化的真正境况，也诱导作家们进行西藏书写时有意无意地神秘化、伪民俗化，其中甚至包括许多生活在西藏地区的藏族作家。还原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便是要展现西藏地区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展现真实而又不断变化发展的西藏，抒写西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历程。次仁罗布高度评价此作品，认为其在西藏文学中首次以大篇幅记录西藏农村的当代变迁以及这个过程中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消融。^[14]

普村闭塞传统，延续着一直以来的宗教生活方式，祖上曾有过活佛的强苏一家是这里的尊贵之家。但自从精明能干的铁匠扎西一家致富以后，村民虽然仍不和他一个碗喝酒、仍看不起他，但内心的天平已然发生了倾斜。结果便是年轻一代开始走向附近县城，脱离传统的务农生活。尼玛潘多聚焦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转折和内心世界。作者意识到了现代化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性的后果。强苏多吉便是作者这一意识的突出体现，他是普村最尊贵之家的儿子，不愿意与两个哥哥共妻，进入了城市。但到了城市，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钱，这时城市已经沒有一块地方可以让他立足。他却沒有回到普村，而是动了邪念，成为无赖，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普村人进入城市的道路都很曲折，桑吉、达吉、边吉三姐妹的城市之路便如此。达吉是三姐妹中最渴望逃离普村也最具有经济头脑的人，她主动要求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住处也离县城较近的阿叔次仁，然后开始卖奶酪，组织村民办奶酪合作组，但因为合作组人员各怀私心，最后达吉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累死累活耗费了心神；她开酒馆，并与货车司机普拉结婚，但婚后的普拉却疑神疑鬼又不求上进，这导致两人的关系日渐艰难，酒馆也成为失败婚姻的陪葬品。大姐桑吉

的城市之路可说最为坎坷，也最为幸运。她本为寻找孩子的父亲——强苏多吉而来，但找寻无果，最后被阿妈曲宗收留，后来两人感情升温，桑吉成为阿妈曲宗的义女，从而留在城市里，她靠每天给别人做临时工维持生活；单位的单身汉司机强巴爱上了桑吉，两人渐渐互生情愫，顺理成章地成为夫妻。小说中虽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给边吉，但依然能够隐约看出其城市之路。被二姐达吉带进城市之后，她帮忙打理酒馆，但姐夫普拉却经常打骂她，在同龄小姐妹的诱迫下，她开始偷家里的酒、食物和钱，以便与一些无所事事的小年轻鬼混。显然，三姐妹的城市之路都曲折艰辛，她们浓缩了现代化进程中许许多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尼玛潘多的《紫青稞》超越了一般的西藏小说，聚焦更为宏大的城市化题材，关注工业化过程中的乡村变迁。

然而，《紫青稞》在现实主义以及宏大题材下又是西藏的。已有学者指出：“紫青稞”这个关键词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西藏的精神，西藏的气质”。^{[15] (P. 102)}三姐妹与“紫青稞”组成一个一致的象征意义——不屈与抗争。紫青稞品质差，产量低，口感也不佳，它连同普村人的贫穷落后一起受到外乡人的歧视，但紫青稞却是顽强的，是极具生命力的植物，它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这正是作者借“紫青稞”所要传达的意义所在。三姐妹身上展现出来的，亦是这样一种顽强抗争、积极追求人生幸福的精神。桑吉在城市中虽然经历磨难，但敢于抛弃传统观念，通过辛勤劳动，支撑了一个家，同时也逐渐获得了爱情；达吉更为勇敢，更为独立自主，其抗争也更为坚决，开酒馆、开商店等，不顾他人的眼光和议论，通过努力来改变生活。她们的母亲阿妈曲宗是一个苦难但顽强的女性，早年丧夫，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房屋多次被洪水冲走，这些都没有击垮她。阿妈曲宗与几个孩子的顽强又不一样，她在宗教中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对抗困难的勇气，而三姐妹甚至包括大哥罗布旦增抗争命运依靠的则是自己的信心和能力。传统的生活习惯束缚了藏族女性，小说用三姐妹展现了社会转型中女性对传统角色的反抗和超越，展现了“女性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被动、无奈和抗争，以及当下生活中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16] (P. 182)}

尼玛潘多的生态抒写不是简单地批判传统生活，而是客观地展现西藏地区社会转型中的变化，通过这种原生态的写作方式，提供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西藏。小说的“紫青稞”意象以及三姐妹等形象，所要展现的正是顽强抗争以实现自我救赎的西藏精神。这恰是藏族人民能在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世代延续的根本精神。

四、当前国内生态批评的局限

藏族作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书写了当前西藏地区所遭遇的文化生态问题。扎西达娃从简单批判藏族旧有风俗，走向深层次领悟和思考藏族文化根脉及其当代传承之道，对藏族文化的大放异彩充满信心；次仁罗布以新的叙事方式呈现藏族文化的精髓内涵，关注藏族文化的当代境遇，特别是藏族富于价值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令人扼腕的陨落；尼玛潘多的目光更为具体，原生态地呈现西藏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改变，聚焦藏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抉择和成长，在社会转型的宏阔主题下生动展现了文化变迁过程中个体内心的复杂过程。

全球化语境中已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僵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故步自封显然是不可取的做法。西藏地区的现代化虽然相对国内其他地域要晚，但一旦进入发展的语境，就必然会使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变化。西藏有着厚重而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导致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差异更明显，文化冲突更剧烈。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不可避免会暴露目前尚无法解决的负面因素，如拜金主义、工具理性以及生态破坏等等。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最为关注的莫过于文化生态问题。当经济思维及其特有的工业文化攻城略地时，通常会使得传统文化遭受较大的冲击，在两者的对抗与交融中，会出现一定时期的过渡甚至文化真空期。因此，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如何更大程度地继承和发展已有传统的优势，并尽可能地规避现代性的负面因素，以形成

一种具有特质的新的文化形态,这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当前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预示着生态写作将长时间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此语境中,生态批评具有文学和现实双重意义。总体来说,国内的生态批评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做出了许多有影响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基于对藏族作家文化生态叙事的研究,发现当前生态批评尚有如下局限:

其一,在建构普适性理论的时候忽视了文化差异。生态危机虽然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但不同地域所面对的实际生态问题并不相同,不同文化解决生态问题的资源和方式也并不相同。就此而言,生态批评陷入了悖论困境,生态批评的出发点是现代性危机,但却没能规避现代性的根本性问题——单一性。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语境的生态问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述并不相同,这需要具体对待。

其二,基于拯救生态危机的现实出发点,生态批评强调通过文学研究来重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虽然生态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但仍然将世界进行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划分。这也正是现代性思维的普遍范式,但

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最佳范式或所有范式。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并非二元分离,而是二者融为一体,这显示了生态问题具体化的重要性。

其三,环境问题本质上是文化生态问题,必须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讨论。但国内的生态批评仍然重在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一个被破坏的外在世界或者是作者所构建起来的理想乐园,以此来反观当前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这是一种较为浅层次的批评路径,在西方的生态批评中,已转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和讨论环境问题,“主要针对人类文化(尤其在现代条件下)对自然的操纵或重新创造来思考自然”。^{[17](P.149)}

其四,生态批评强调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关于生态的内容,将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照,并研究作者的生态观。与许多文学的外部研究所出现的问题一样,生态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显然,文学作品并非调查报告,任何角度的文学研究都不能忘记文学审美性和艺术性的问题。生态批评的细化和深化需要在更为具体、更为平等、更注重文学特质的基础上进行。

〔参考文献〕

- 〔1〕〔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庄晨燕,邱寅晨译).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2〕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 〔3〕〔美〕杰里·D·穆尔(欧阳敏等译).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4〕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 〔5〕徐琴.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评扎西达娃及其小说创作〔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 〔6〕王绯.魔幻与荒诞:摆在扎西达娃手心儿里的西藏〔J〕.当代作家评论,1993,(4).
- 〔7〕傅钱余.与魔幻、荒诞无关——扎西达娃研究的一种路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6).
- 〔8〕胡沛萍,次仁罗布.文学,令人驰骋——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访谈录〔J〕.西藏文学,2011,(6).
- 〔9〕扬帆.盛开在雪域高原的一朵奇葩——漫谈青年作家次仁罗布近年来的小说创作〔J〕.西藏文学,2011,(5).
- 〔10〕〔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1〕巴金.巴金小说名篇〔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 〔12〕角巴东主.《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06,(1).
- 〔13〕王舒,王昕秀.尼玛潘多:《紫青稞》还原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真西藏〔EB/OL〕.http://www.tibet.cn/news/index/zzyw/201009/t20100901_623549_1.htm(2010-09-01/2014-10-30).
- 〔14〕明江,郭艳,次仁罗布.尼玛潘多长篇小说《紫青稞》三人谈〔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

wxpl/2010/2010-06-03/86275.html (2010-06-03/2014-10-30).

- [15] 刘涛. 从想象到写实——关于西藏的两种叙事模式 [J]. 南方文坛, 2013, (5).
[16] 严英秀. 中国藏族当代女性文学 30 发展简述 [J]. 中国藏学, 2013, (1).
[17] [美] 劳伦斯·布伊尔 (刘蓓译).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A Study on Narratives of Cultural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Writers ——Views about Limitations of Current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U Qian-yu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 Cultural ecology is a primary concern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writers who have been approaching the issu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in different ways. Tashi Dawa started with criticizing the outdated Tibetan customs and then moved in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n Tibetan culture and its inheritanc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sering Norbu presented the essence of Tibetan culture with new narratives and showed a lot of concern for the plight it has been trapped in. Nyima Phentok attempted to give an authentic and vivid depiction of the changes the villages in Tibet have undergone,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feelings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n narratives of cultural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writers reveal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uch as the tendency towards oversimplification and patterning in addition to an exclus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modernity; Tibetan literature; cultural ecology; ecologic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宝玉柱〕